

实际出资人排除股权执行问题探析

执行异议之诉

研究

◇ 苏 萌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股权代持作为一种特殊的投资安排日益普遍，其典型特征表现为“名实分离”，即实际出资人（即隐名股东）与名义股东相分离。当名义股东的债权人基于生效法律文书向执行法院申请对登记于名义股东名下的股权采取强制执行措施时，实际出资人是否享有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是司法实践中的重大疑难问题。我国现行立法对此未作明确规定，学说理论亦未形成共识，司法实践中存在“肯定说”与“否定说”两种对立观点。今年7月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执行异议之诉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执行异议之诉司法解释》）没有囊括曾在征求意见稿中出现的实际出资人排除执行条款，而在今年10月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公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则对此问题提出了明确方案。为协调理论实践冲突、推进法律统一适用，有必要进一步梳理争议焦点，明确裁判规则的构建意旨和适用思路。

一、从权属指向的实质出发：支持排除执行

司法实践中，针对实际出资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法院就是否支持其排除对案涉股权强制执行请求，逐步形成了“肯定说”与“否定说”两种代表性裁判立场。其中，“肯定说”主张在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不一致的情况下，应当允许符合条件的实际出资人阻却强制执行，其法理依据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坚持股权实质归属原则。该观点认为，股权作为一种财产性权利，其真正来源在于出资事实与出资意思。实际出资人通过履行出资义务并实际行使股东权利，已成为股权的实质性权利人；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所作的股东登记，性质上属于宣示性登记，仅产生权利推定效力，并不具有承担创设权利的任务。因此，在执行程序中，当涉及确定股权的真实归属时，应确认实际出资人为

股权的实际所有权人。

第二，限缩外观主义适用范围。根据商法理论，商事外观主义的适用并非没有边界，其原则上应局限于存在交易关系的场合，以此保护善意第三人对于权利外观的合理信赖，从而维护市场交易安全。在执行程序中，申请执行人通常并非基于对该股权登记外观的信赖而与被执行人（名义股东）发生交易行为，亦即所涉股权本身并未作为交易标的。在此种非股权交易背景下，若仍严格贯彻外观主义，将使该原则超出其制度目的，缺乏适用的正当性与必要性。例如，在某案件中，法院裁定认为，王某（申请执行人）在本案中以案涉股权主张执行，并不是基于以案涉股权为标的的交易行为，而是基于王某受让了某银行的债权，其权利基础系普通债权，王某不属于商事外观主义保护的第三人，并无信赖利益保护的需要。

第三，贯彻公平原则价值追求。执行异议之诉制度的设立，不仅关注申请执行人债权的实现，也需权衡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实体权益。作为一种特殊的救济程序，其核心价值追求是实现个案中的公平与实质正义。当实际出资人的真实权利有充分证据证明，且其对权利外观的形成并无过错或重大过失时，优先保护其物权或类物权性质的权益，符合民法及民事诉讼法所倡导的公平原则，有助于防止因单纯的形式判断而导致实际权利人承受不测损害，从而更好地实现法律效果的实质公正。

二、从名义表征的秩序出发：否定排除执行

与“肯定说”相对，“否定说”在司法实践中亦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论证体系，主张实际出资人原则上不得排除名义股东的债权人对案涉股权的强制执行。该说主要立足于以下几个层面的法理考量：

第一，恪守合同相对性原则。在“否定说”看来，股权代持关系的法律本质是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之间成立的委托投资合同或类似债权债务关系。该关系仅在合同当事人之间产生拘束力，具有鲜明的相对性，故实际出资人基于代持协议向名义股东主张的权利，本质上属于一种债权请求权。当名义股东的普通债权人申请对登记于名义股东名下的股权采取强制执行措施时，该债权人并非代持合同的当事人，不受合同内容的约束。因此，实际出资人不得以其内部的、相对的债权债务关系，对抗外部第三人对于包括案涉股权在内的执行标的享有的、经过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债权。例如，在某案件中，法

院裁定认为，邱某某（实际出资人）基于实际出资对邱某和（名义股东）、某公司享有请求确认其为股东的权利，但其要取得股东地位仍需履行一定程序，并不因出资当然享有股东地位。在履行程序成为股东之前，其所享有的权利在本质上是一种债权请求权。李某某（申请执行人）对邱某和所享有的权利亦为债权。在执行行动中，邱某某的债权并不优先于李某某的债权。

第二，维护商事登记公信力。商事登记制度的核心功能之一在于向社会公众提供统一、稳定、可信的权利外观，以降低交易成本，保障交易安全。公司登记机关所作的股东登记信息，依法具有公示效力与公信力，债权人在与名义股东发生交易关系时，有权信赖该登记信息的真实性，并基于此外观安排自身的交易行为与风险预期。若允许实际出资人以其隐蔽的实际权利轻易击破登记的公信力，将严重损害交易秩序的稳定性，动摇商事登记制度的根基。比如，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再46号民事判决认为，法定事项一经登记，即产生公信力，登记事项应被推定为真实、准确、有效，善意第三人基于对登记的信赖而实施的行为，受到法律保护，即使登记事项不真实、不准确，与第三人的信赖不符，善意第三人也可依照登记簿的记载主张权利。只要第三人的信赖合理，第三人的信赖利益就应当受到法律的优先保护。

第三，贯彻风险自负法理。实际出资人出于各种原因，自主选择隐名持股、不将股权登记于自己名下，此种安排本身即意味着其自愿承受因名实分离所带来的各种潜在法律风险，其中之一便包括股权被名义股东的债权人申请强制执行的风险。既然实际出资人是此风险安排的受益者或决策者，根据所谓“自己选择，自己责任”的基本法理，其理应承担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进言之，将此风险分配给主动选择隐名的实际出资人，相较于分配给对此全然不知情、仅信赖权利外观的债权人，在法律责任的分配上更为公平合理。例如，在某案件中，法院判决认为，实际出资人选择隐名固有其商业利益考虑，既然通过代持关系获得了这种利益，或其他在显名情况下不能或者无法获得的利益，则其也必须承担因此可能出现的风险。实践中，股权代持行为时常被用于规避公司法、证券法等领域中关于股东身份、资格、人数或投资限制的强制性规定。如果在执行异议之诉中普遍性地认可实际出资人可排除强制执行，将在客观上产生鼓励乃至纵容以代持形式规避法律、架空监管的负面效果，更可能助长隐匿资产、

逃避债务的不良风气。因此，为维护法律权威、防范系统性风险及倡导诚信市场的公共政策，“否定说”认为，应对实际出资人排除强制执行的权利主张持审慎态度。

三、司法政策的路径选择：名实相符，以实为先

在《执行异议之诉司法解释》最终文本中，征求意见阶段曾出现的两种立场相左的方案设计均未予采纳，即该解释回避了“实际出资人能否排除股权强制执行”的问题。但是，通过对该解释中各类案外人排除执行情形的分类规范——诸如商品房消费者、不动产买受人、以物抵债权利人、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人以及承租人等的权利保护要件进行体系化梳理，仍可从中归纳出在处理案外人执行异议时的基本考量因素与判断逻辑，进而为理解实际出资人权利在强制执行程序中的定位问题提供分析依据。

第一，合同要件的基础性。相关条文多以“合法有效的书面合同（或协议）”为前提（如第十一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等），强调法律行为的形式正当性与意思表示真实性。这不仅符合民法典第一百四十三条关于民事法律行为效力的规定，也凸显了合同作为权利溯源的核心地位。第二，对价支付的实质性。此为条款，案外人需证明已支付全部或部分价款（如第十一条、第十三条），该条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的一贯要求。第三，占有行为的客观性。第十四条、第十五条及第二十条均要求“合法占有”不动产，彰显“占有”作为物权公示的补充方式，在司法实践中的权利外观佐证意义。而对于实际出资人排除执行问题，《公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提出了新的方案。其第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名义股东的金钱债权人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登记在名义股东名下的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符合本解释第三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显名条件或者已经缴纳全部出资的实际出资人，在执行异议之诉中请求排除强制执行，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是在人民法院首次查封股权后，实际出资人在合理期限内未依法提出异议的除外。”该规定基本延续了《执行异议之诉司法解释》的体系精神。

第一条条件，实际出资人欲排除强制执行，股权代持协议合法有效是前提，无须赘言。第二项条件，实际出资人需在法院查封股权后、合理期限内提出异议，此为程序要件，避免实际出资人怠于主张权利，导致法律关系长期不稳定，该要件体现了权利

行使的时效性要求，旨在维护法律关系的安定性和执行效率。第三项条件则分为两种情形，满足一种即可。其一，要求实际出资人“已经缴纳全部出资”，这体现了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原则。毕竟出资是股权权益的实质来源，股东资格的核心是出资，实际出资人履行出资义务是享有股权权益的实质性依据，仅凭代持协议而未实际出资，则缺乏排除执行的正当性基础。而且，强调出资的实质性，可有效防止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恶意串通，通过倒签代持协议规避执行，该规定要求实际出资人的权利主张具备充分的经济基础，符合公司法“出资取得股权”的基本法理。其二，隐名股东依法显名，此要求实质是公司人合性下的“公示”行为，与“占用”的意图相同。实际出资人若已实际行使股东权利（如参与决策、获取分红），且为公司及其他股东所知悉，则其权利已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内部公示效应，不再是纯粹的内部债权，此种事实上的“准占有”状态，增强了其权利对抗效力的正当性，也缓和了代持关系固有的隐蔽性与保护交易安全之间的紧张关系。

综上，在司法政策的制定中，关于实际出资人能否排除对代持股权强制执行的问题，其规范构造与一般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审查标准具有显著共通性。两者均围绕合同效力、对价支付情况以及一定的权利外观形式等核心要素展开，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套旨在兼顾交易安全与实质公平的规则体系。这一体系的建设目标，并非意图动摇商法中外观主义的基本原则，而是在尊重权利外观公信力的前提下，通过审慎的利益衡量，达成更为全面的法律价值整合，以期统一长期存在的裁判分歧，提升司法实践的可预期性和确定性。

进一步来看，上述要件之间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合同有效性构成权利主张的正当性前提，实际支付对价则反映财产权益的真实归属，而对特定公示方式的考察，则在相当程度上增强了隐名权利的外部对抗效力。诸要素彼此衔接，共同构成了一个从权利来源到外在表现的系统性审查路径。笔者认为，这也预示着未来司法实践的规制发展方向：在对实际出资人是否享有排除强制执行的权利进行判断时，将更加注重权利取得的实质真实性及权利公示的充分性，从而推动构建更符合现代市场经济发展需求的权责清晰、流转顺畅的公司股权秩序。

【本文系2023年度国家社科一般项目《强制执行法典化背景下执行力主观范围扩张研究》（项目编号：23BFX13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

依法整治平台“内卷式”竞争 促推形成市场良性竞争秩序

——新反不正当竞争法实施与平台“内卷式”竞争治理座谈会综述

问题探讨

◇ 韩 煦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新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以下简称新反法），贯彻党中央关于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精神，针对平台“内卷式”竞争新增专门规定。为了解实际情况，听取专家意见建议，依法依规有效治理平台“内卷式”竞争。近日，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互联网司法研究中心组织召开“新反不正当竞争法实施与平台‘内卷式’竞争治理”座谈会。现将会议研讨情况综述如下：

一、关于平台过度补贴问题

平台市场进入存量博弈阶段后，竞争主体在有限市场空间内为争夺既有市场份额进行过度投入。目前，由平台发起的过度补贴和唯低价导向等“内卷式”竞争，不仅冲击正常价格秩序和竞争秩序，还造成资源的过度消耗和低效利用，严重影响经济持续向好发展。

平台是一类独立的市场主体，其自身的价格行为、补贴行为应遵守价格法，平台间的竞争行为应遵守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等法律法规。正常情况下，平台为吸引新用户或者开展短期促销付出的补贴成本往往带给平台更多的收入，平台整体将处于盈利状态。为排挤竞争对手、抢占市场而实施恶性补贴，平台根据其自身定价获取的各项收入显著低于补贴成

二、关于平台强制低于成本价销售问题

平台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平台内经营者低于成本价销售商品或提供服务，本质是平台将自身竞争压力传导给平台内经营者，最终挤压平台内经营者的利润空间。同传统行业相比，平台强制低于成本价销售的扩散性更为广泛，对市场秩序的危害更大，故应从快从重进行治理。针对平台市场中愈演愈烈的“内卷式”低价竞争，新反法第十四条明确禁止平台强制或变相强制平台内经营者低于成本价销售。这是治理平台“内卷式”竞争的重要法律依据。

平台强制低于成本价销售在实践中相对容易判断，但变相强制具有隐蔽性，往往难以识别。目前，实践中平台变相强制低于成本价销售的情形主要包括：（1）算法与技术控制。例如，平台通过算法实施“唯低价”导向，将搜索权重、流量分配倾斜给低价商家，甚至直接利用技术为商家设置商家负担成本的促销，同时利用搜索降权、流量限制等惩罚不配合的平台内经营者。（2）规则与协议捆绑。例如，在平台协议或活动规则中，隐含设置低于成本价销售的要求或将该要求与流量资源、核心推荐强行绑定。（3）平台通过大额补贴变相强制商家跟进补贴。平台向海量用户发放大额补贴券，用户只会选择可以使用补贴券的商家，商家为获得交易机会就不得不接受用户使用补贴券支付并自行负担有关成本，否则就没有交易。这是一种新型的变相强制，也最为普遍，应成为新反法重点规制的情形。

此外，制止平台强制低于成本价销售，要注意新反法与其他法律的适用关系。一是与反垄断法的协同。反垄断法主要规制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没有正当理由的低价倾销行为。新反法第十四条不要求平台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将覆盖更广泛的行为主体。二是与电子商务法的界分。电子商务法第三十五条禁止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对平台内经营者附加不合理限制，包含但不限于强制低于成本价销售。新反法第十四条仅针对平台强制低于成本价销售这一特定行为。因此，对于平台强制低于成本价销售，应优先适用新反法第十四条。平台对平台内经营者附加其他不合理限制或条件的，则只能适用电子商务法第三十五条。三是与价格法的联动。针对平台强制低价倾销的行为，正在修订的价格法进一步完善低价倾销的认定标准，在不正当价格行为中专门增加“强制其他经营者按照其定价规则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倾销”。因此，平台强制低于成本价销售未来可能还面临价格法的叠加规制，违法成本将显著提高。

因此，新反法第十四条采取行为法的规制

模式，只要平台强制低于成本价销售并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即可适用。价格法关于不正当价格行为的新增规定和电子商务法第三十五条作为行政监管条款，无须证明平台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可以实现“快、准、狠”的早期行政执法监管。

三、平台奖惩措施形成的隐性“二选一”问题

为增强或巩固市场竞争力，平台会强制或变相强制平台内经营者在该平台和其他竞争性平台之间做出“二选一”。平台可以通过明示方式强制要求平台内经营者实施“二选一”。例如，平台明确要求平台内经营者只能与本平台独家合作或者只能将特定商品、特定内容在本平台独家发布，或者要求平台内经营者不能与特定竞争性平台合作或者不能参与特定竞争性平台的促销活动。这些都属于常见的显性“二选一”。实践中还存在隐性“二选一”，主要表现为平台通过激励性措施诱导平台内经营者实施“二选一”。例如，平台通过补贴、折扣、优惠、流量支持、赠送服务等奖励性措施诱导平台内经营者不和其他平台合作，实施“二选一”。其实，无论显性“二选一”，还是隐性“二选一”，本质都是平台限制平台内经营者的自主经营权，限制的具体内容实质相同，只是采取的方式方法有所不同。

平台通过奖惩措施诱导或者变相强制平台内经营者实施隐性“二选一”，同样可能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具体可以适用新反法的一般条款予以规制。新反法特别强调对变相强制行为的规制。对于隐性“二选一”，应重点关注平台是否通过算法推荐、流量分配、活动配合、排名权重等“软性”规则，奖励或优待配合的平台内经营者，惩罚或压制不配合的平台内经营者。这种奖惩相结合的方式，正是变相强制的具体体现。新反法的实施，将使早发现、早制止隐性“二选一”成为可能。反不正当竞争法只关注行为本身是否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只要平台经营者实施了隐性“二选一”等

扰乱公平竞争秩序的行为，无论其规模大小、份额多少，都可适用该法予以规制，可以实现早期和广泛的行政执法监管。

电子商务法第三十五条作为行政监管条款，明确禁止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利用服务协议、交易规则以及技术等手段对平台内经营者在平台内的交易、交易价格以及与其他经营者的交易等进行不合理限制或者附加不合理条件。隐性“二选一”对平台内经营者在平台内的交易（如特定商品的首发）、与其他经营者的交易（如独家合作）等进行不合理限制，限制平台内经营者的自主经营权，显然违反该条。同时，无论平台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只要通过奖惩措施变相强制平台内经营者实施隐性“二选一”，限制平台内经营者的自主经营权，就可能违反该条。因此，行政执法机构可以根据电子商务法第三十五条对各种隐性“二选一”进行查处。

可见，关于平台市场中“二选一”的规制，现行法律提供了覆盖不同规模平台、不同实施方式的复合型、谱系化的解决路径，并且已经超越对传统强制措施的简单关注，更深入到平台变相强制措施对平台内经营者经营自主权干预的实质，实现了平台奖惩措施等变相强制形成的隐性“二选一”规制的前置化与精准化。

总之，综合整治平台“内卷式”竞争，并非扼杀平台竞争，而是通过划定底线、明确规则，引导平台竞争从低层次的消耗战、封锁战、价格战转向高层次的创新战、服务战、价值战，迫使平台通过提升质量、优化服务和推动创新来赢得市场。互联网平台经营模式先天具备即时快速的属性，商业模式、竞争态势更是瞬息万变，因此对于平台“内卷式”竞争等违法违规行为，可以适用新反法、电商法、价格法等法律法规予以快速规制，避免行业造成效率下降、创新停滞的重大负面影响，促进平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最终实现经营者、消费者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多方共赢。

（作者单位：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